

孙兰芝 奚学瑤 张从 丁广举 主编

告别未名湖

北大老五届行迹 3



北大前常务副校长王义遒

—— 作序推荐 ——

永不可再的历史 永不可灭的精神

告别未名湖

陈佳洱敬题

北大老五届行迹 3

孙兰芝 奚学瑶 张 从 丁广举 主 编
王智钧 李平安 徐志仁 夏清和 副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未名湖. 3 / 孙兰芝等主编.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108-3950-4

I. ①告… II. ①孙…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7848号

告别未名湖 3

作 者 孙兰芝 奚学瑶 张 从 丁广举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38.75
字 数 7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950-4
定 价 6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15 年 7 月 20 日部分校友与王义道老师大兴九九嘉聚会。从左至右，
 第一排：杨如鹏 朱伟利 卢晓林 孙兰芝 王义道老师 林江东 刘兰平 林建初
 第二排：孙雨南 鲁公儒 张 从 王智钧 常绍舜 徐志仁
 第三排：丁广举 许同茂 夏清和 吴根耀 陈世崇 李平安



© 2015 年 5 月 11 日部分校友大兴九九嘉聚会。从左至右，

前排：朱伟利 杨静韬 礼庆贵 杨桂香 李海文 陈秀兰 孙兰芝 刘兰平 郑斯宁 丁广举
 后排：孙雨南 杜庆臻 张 从 李炳海 刘家义 王智钧 李平安 余德义 徐 森 白玉林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广举	丁克义	于远河	王志敏	王智钧	白玉林
卢晓林	礼庆贵	孙兰芝	孙雨南	朱伟利	朱昌彻
李平安	李国治	李海文	刘兰平	任尚芬	陈泽尊
邱曙熙	宋光阳	吴志雄	吴根耀	贡安南	杨如鹏
张 从	林江东	林建初	周大晨	欧潭生	郑克中
郑斯宁	武思敏	俞俊鸣	祝家麟	姜国廷	姚成玉
奚学瑶	徐志仁	夏清和	董汉河	鲁公儒	鲍寿柏

臧 振

常务编委

丁广举	王志敏	王智钧	孙兰芝	李平安	刘兰平
朱伟利	宋光阳	张 从	奚学瑶	徐志仁	夏清和

主 编 孙兰芝 奚学瑶 张 从 丁广举

副主编 王智钧 李平安 徐志仁 夏清和

序 永不可再的历史 永不可灭的精神

——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3》

王义道

一、《序》的序，北大之大

2015年3月20日，丁广举、孙兰芝夫妇到我家来，带来两册厚厚的《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说是还要出版第三集，希望我能写个序。老五届的人，我熟悉。我教过的，身边一起工作的，直到现在退休了仍在共事的，都有老五届。凡是北大人的来龙去脉我都感兴趣。我这个人正经书读得不多，杂书倒是很爱看的。对有关高等教育的书，我还写过二三十篇序或评，抒发自己的感想、心得和体会。可是当我打开这两本书，发现作序者先有钱理群，后是高放。这两位北大校友都是人文和社科领域的著名学者，思想开放，造诣精湛，著作等身，声望远扬。我怎敢忝列其中！我的专业领域极窄，尽管研究工作近来已跟亿万百姓生活有点相关（涉及卫星导航系统、智能手机、精确校时等），却鲜能显山露水，走出台面。后来不得已从事大学管理，主持学校教学科研行政，试图为广大师生建功立业效点劳，可惜只是疲于奔命而已。当我正待说出“另请高明”之际，看到书中熟悉的名字，脑子里飘浮出一张张鲜活的脸孔。《一朵溜溜的云》——技物系1963级聂永泰被狼吃掉的惨痛故事，我在参与编辑《北京大学物理百年纪念文集》时已经读到了，这里又赫然展现在文集中。这样荒诞的事还能再现么？我强烈地感到，我有责任说话，尽管许多话钱理群和高放两位先生可能都已说过了。责任驱使我还要说，要多说，一直说到如此悲惨荒唐的事不再重演为止！而且，来人心诚意切，我不好推辞了。

从本集以作者在校时的系别来分辑的体例，我还猜想，主编者要我来写序，是否还含有一点“平衡”的意味？北大老五届自然包括人文、社科和理科当年北大所有专业的毕业生，文科（含人文与社会科学）有人作序了，没有理科人说话似乎有点对理科毕业生“不公”；尽管陈佳洱前校长题写了书名，跟“说话”总是不大一样。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不是以文、理分野，“说话”大体会是相同的。所以，要说的话可能钱、高两位先生基本上都已说完了。然而，文、理毕竟还会有点视角不同，所以

我就可尝试着找一些他们没有提及的，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的“说法”。另外，论年龄，他们二位中一位（钱）比我小七岁，一位（高）比我大五岁，我恰好在中间。那时，中国处于一个激荡年代，差三五岁，见识和体验就会很不一样。比如，高放先生见识过国民政府管治下的北大，我就没有经历过；钱理群先生有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边远地区卫生学校当语文教师的历练，与老五届比较贴近，我就没有这样的体验。但是，我有1952年院系调整的经历，我们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清华物理系一年级学生，很不情愿地跟着一大批名师^①转到了燕园，和北大、燕京以及少量其他大学的文理学科的师生组成了“新北大”。这点经历，使我对北大的看法有了另一种情结，它也可能无意间自然渗透在我对北大“老五届精神”的理解中。这也是我不揣冒昧来写这个序的一个动因。

上两集已对老五届概念做了介绍，指的是1966年“文革”爆发时的在校大学生，属于1961—1965级，全国有53万多人。这是一代国家顶梁柱的数字啊！北大老五届有9000多人，其中物理、生物、技术物理、地球物理、化学、无线电电子学等六个系及数学力学系的力学专业是六年制，包括1960级，实际上是“老六届”了。他们前三届1968年毕业分配离校，后两或三届1970年毕业。我查了《北京大学纪事》，1968年的《纪事》居然没有片言只字提到几千人毕业离校，可见当年学校主事者对这样一件群体大事的肆意轻蔑（这绝不是《纪事》编辑者的疏忽，而是没有原始资料的依据）。只是在11月19日记录了一条宣传队上报《关于六年制毕业生提前毕业的请示报告》，“提出752名六年制学生提前一年毕业”，但没有下文。据我所知，并可从本书三集得到印证，他们还是在1970年和其余学生一起毕业分配走的。《纪事》的1970年里倒有一条记录：3月17日，3821名（“文革”前入学的）毕业生分配离校（除71人外）。《纪事》没有说这71人未走的原因及后来去向，我想可能不少是留校的，至少那年我所在的汉中（653）分校三个系就留下了一个不算少的数目。

三本集子汇总了220多篇文章，可以说是代表了这9000多人的群体，比例达2.4%。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百分数了。我不晓得编者是否还要继续编下去。不过我相信，以北大之大，中国之大和世界之大，虽然以交通发达、信息敏捷为标榜的当下，处在犄角旮旯里的北大老五届中不知此书的恐怕还有人在，即使是凤毛麟角，他

① 当时理科有叶企孙、周培源、段学复、程民德、丁石孙、王竹溪、黄子卿、张青莲、唐有祺、冯新德、谢义炳、林超、王乃樑、沈同、赵以炳等，文科有冯友兰、张岱年、王宪钧、吴组缃、王瑶、朱德熙、冯至、杨周翰、李赋宁、周一良，后来还有陈岱孙和费孝通等来自清华，燕京则有洪谦、赵靖、雷洁琼、蒋荫恩、林庚、林焱、赵萝蕤、侯仁之、张芝联、徐献瑜、诸圣麟、张滂、林昌善、王平等，其他大学有王力、张世英等。三校合并时就教师和学生人数看，理科还以清华居多。1952年院系调整是国家工业化的一个举措，从我国高等教育史整体来看是败笔，是倒退，它导致高校“学”与“术”区割，基础与应用学科分离，理论与实践脱节，真正的综合大学消失，“育人”的教育体系成了“制器”的工具系统。

们甚至还会讲出更令人吃惊的故事。不过，从代表性而言，这三集似乎已经可窥一斑而见全豹了。

读了本集的多数和上两集的部分文章，对于这一群体的遭遇、历练、业绩、成就和命运，我觉得高放先生以“骄子、棍子、弃子、才子、赤子”的“五子登科”来概括他们的五彩人生总体上是妥适的。地质地理系1964级王志敏的《五子吟》生动、深刻地诠释了高放先生的“五子说”。文章开宗明义说：“读高放老师《告别未名湖2》序，‘五子说’像一面镜子，照见北大老五届的影子，印下他们半个世纪的足迹。五子，似可作为北大老五届的别号了。”听说老五届中有人不太赞同这种说法，认为自己至少没有当过“棍子”。我想这是真的。但就群体而言，高放先生的概括大致没有错。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一群人当年不是被更高更大的领袖用来当枪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初充当了“棍子”吗？只是后来又觉得他们不听使唤，才变成“弃子”，甚至是“逆子”而加以惩罚。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可是你知道有某姓某名的群众吗？你知道的历史都是有名有姓的英雄或精英创造的，群众“被代表”了。英雄们叱咤风云，群众却默默无闻，但终究成为历史的一员，而且承担着历史的一切后果。

然而，更使我感动的是：当他们在“告别未名湖”，经受了我认为应属于“极端”的遭遇之后，依然充满信心地去实现自我，终于实现了从“弃子”到才子的过渡；以及在叙述自己这段经历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无怨无悔的“赤子”情怀。这反映了北大学子的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豁达宽容的气度。这是一个真正的人的精神和气度。有人可能会说，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是清华的校训么？是的。但清华这校训是从梁启超1914年对该校的“君子”演说中引用《周易》的两句话而来的，11年后梁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可是，梁启超还是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积极筹建者呢，该校的第一个《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就出于梁的手笔。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的文理两科大多数教师和全体学生都转到了北大，包括清华存在仅四年的国学研究院在内的衣钵不是都由北大人来传承了吗？我们只要看一看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的嫡传弟子汪钱在1966年6月11日受批判后自杀，成为北大“文化大革命”第一位“祭旗”的牺牲品就一目了然了。

我还特别欣赏整个校园都并入北大了的，为燕大人所深刻铭记的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尽管它带点宗教色彩，但却完全可以做世俗的、非常合乎逻辑的解读，从而陶冶出具有精英意识的国民。我想，京师大学堂1902年就合并了1862年成立的同文馆，1905年废科举之后，实际上承担了部分国子监的任务（当年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认为这样一来京师大学堂任务太重了，因而提出辞呈）。所以，它从办学一开始就展现了“兼容并包”的风度。再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一直高举着科学与民主、爱国和进步四面大旗。1952年的院系调

整是再一次的大包容，使三校的优势和精神得以大融合、大凝铸，成就了北大人特有的新精神。不怪乎 2011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中《北京大学文化研究》一书的题名为《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鲜活地点出了北大文化的核心。

北大之大，还来自它的学科结构。我深信，世界上所谓学问，不外乎两门，这就是关于自然和人的，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其余一切的应用学科和工程技术，都可以从这两门派生出来。蔡元培的“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的说法是合乎实际的。我本人是学物理的，研究的却偏重于技术，我毫无鄙薄技术的意思，但事实确是如此。自然和人文社会两大学科，其范围宽广无比，而且互相包容。你可以说人文社会学科是自然研究的一部分，因为人终究是由自然产生的，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你也可以说自然科学是人文研究的一部分，因为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的认识，离不开人，主体还是人。而这两者的学术内容又是无限的，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对人的研究亦如此！我十分欣赏心理专业 1964 级的徐岫茹在《告别未名湖 走进“心世界”》一文中引述的雨果名言：“人心比任何地方都更炫目，也更黑暗；精神的眼睛所注视的任何东西，也没有人心这样可怕，这样复杂，这样神秘，这样无边无际。有一种比海洋更宏大的景象，那就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宏大的景象，那就是人的内心世界。”这两类学科的疆域都是无穷无尽、无边无涯的，从事这两门类学习和研究的人难道会不胸襟开阔，心怀坦荡吗？

二、永不可再的历史

怎样看待北大老五届学子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所怀抱的无怨无悔、充实坦荡，甚至满足的心态？难道他们没有遗憾，他们“认命”了么？不！正如张文（力学专业 1964 级，原名张维善）在《徒有飞鸿志 经世化烟尘》一文结语中所说：“我感觉我的戏还没有开场就落幕了。”但是他没有埋怨未名湖，“未名湖塑造了我……如果灵魂可以寄托，我仍愿将来生来世寄托于未名湖”。而写《在美国当教授》的物理系 1965 级任尚芬的感受是：“我觉得世界上其实真正一帆风顺的人并不多，即使有，也未见得自知，未见得珍惜，更未见得成功，当然也未见得幸运。其实，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将面临一些特有的困难。我们每个人的自身条件不同，际遇不同，选择也不同，生活之路不必强求。只要我们尽力了，我们的人生之路都值得自己骄傲，值得别人尊重。”我想这是大家的共识，是“北大之大”造成的豁达大度的气概使然。中文系 1965 级黄虹坚的态度更为积极，她将离别未名湖发配到洞庭西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其情其景写成了一本电影文学剧本《湖草萋萋》。她说：“想起那一片湖的人和事，也想到了一个错误的年代对人性、青春、知识的轻侮甚至是摧残，但我也就是在那儿收

获了刻苦、坚持和顽强，特别是文学创作必需的对人的同情和对人性的理解。写作的那几天我心情很沉重，反复想到的是无数人在那个年代付出的各种牺牲。但我也清楚地知道历史没有‘如果’，生活也不会有‘假设’，西湖的事就是这样被我们真实地亲历了一遍。我的责任是留下一些真实的细节、氛围，留下一点可供研究的文字，告诉后人：我们不曾遗忘。”我想，这何尝不是写这 220 多篇精彩、真实文字的北大老五届人的共同心愿呢？

有人看到北大老五届不少人后来成为各级骨干、国家栋梁，就说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浸透了未名湖的灵气，还因为他们经受了“四个面向”（面向基层、农村、工矿、边疆）的历练，所以他们“接地气”，了解国情。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章句下》）似乎老五届这些人后来能够担“大任”，建功立业取得成就，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工农兵“再教育”的锻炼，可以说是“生于忧患”，因而苦难是有“所值”的。这实在是一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荒谬说法。今天看来，当时对一大批大学生和知识青年（甚至包括还够不上有知识的青年）的如此发落，是因为在政治上他们已经无可利用而只能“捣乱”了，而经“文革”的几年折腾，各行各业不务正业，名曰“斗批改”，实则只剩“斗批”而无业可“改”，经济跌入崩溃边缘，城市里已经无法安置这批青壮年劳动力就业了，他们真正成为“弃子”。这是一种扭曲社会的极端状态：愚昧之极、荒诞之极、残酷之极、悲惨之极！

大学之“学”，知识占有主体地位。“知识就是力量！”可是那时候“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时髦。大学里越有知识的教授专家越成为“反动权威”，进“牛棚”，遭侮辱，挨批斗，折磨致死的著名学者不在少数。此风一刮，交白卷成为“英雄”。在接受“再教育”中谁要是还想读点书，学点知识，表现点聪明智慧，必然倒霉。日语专业 1964 级马成三在《职业生涯的“始发站”》一文中述说，在分配去辽宁的包车车厢中有解放军战士巡回值勤，注视阶级斗争“敌情”。一名巡逻战士看到一个同学在看《红楼梦》，居然一把将书夺走要没收，声称《红楼梦》是大毒草。那学生反驳说，毛主席称《红楼梦》是好书，战士则说学生是造谣，争得不亦乐乎，后来长官出面才算解决。黄虹坚的《一个剧本的诞生》记述了在洞庭西湖军垦农场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的日子里，天天检讨批判，狠斗“私字一闪念”，说话要按照一定的程式套路行事。这里成为训练说假大空、套话、官话的场所。来自自由文化园地的北大、清华学子不吃这一套，说了点新鲜的学理论心得，这就倒霉了，不但挨质问训斥，而且被另眼看待，使他们备受煎熬。地球物理系 1960 级的王玮，1968 年被发配到唐山柏各庄军垦农场，几经转折又落到了秦皇岛瓷厂。这个厂的技术科长居然不懂硅酸盐是什么（陶瓷的主要成分），盖厂房不懂勾股定理，房梁老是搭不上。她去一算，梁就搭上了。为此，她失去了留在技术科的资格，就因为她还有一点知识！（《离校后的辛酸与

欣慰》)当下我们拼命呼喊,要创新,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可是你知道吗,曾几何时,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曾容不下一丁点儿创新的萌芽!

更可笑的事例我已不将它列为愚昧而是荒诞了。经济系1963级的伍席源(见《在龟兹故地农村的那些日子》),1968年末被发配到新疆,先在军垦农场锻炼,后又以工作组身份进驻库车县农村。那里是维吾尔族群居地,下乡工作组的任务是“抓批林批孔,促春耕生产”,后来还要批《水浒》。这弄得维族干部十分茫然,他们既不知道孔子,更不知道《水浒》。而按维吾尔语发音,“孔子”如同“水桶”,“水浒”等同“水壶”。一会儿批“水桶”,一会儿又批“水壶”,搞的是什么名堂?干部尚且如此,遑论一般老百姓。难怪百业萧条,经济走向崩溃边缘,真是作孽啊!类似的荒唐事还可举出哲学系1963级的沈耀才在《炼狱》一文中提到的:他夜间在地窝子里读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居然险些发生一场政治风波。原来他看书时用《毛选》的硬纸板封套做底板在上面点上了蜡烛,这被有“左”病的外校学生认为是“亵渎毛主席”而举报了。这种事情当年弄得不好是可以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非同小可。幸好得到同来此地接受“再教育”的南京大学学子的解救,才有惊无险。

事情的残酷远不止此。在第2集国政系1963级鲁仁的文章中已提到的地球物理系的程明萱(第2集中未指名)因女厕所反动标语而遭灭顶之灾的事,在沈耀才的文章中有了更细致的交代。她所受的六七年残酷冤狱谁该担责?更为残酷的是黄泽平之死。图书馆学系1963级杨邦俊在《回忆黄泽平同学》一文中披露了这个令人痛心的残酷事实。黄泽平是一个善于学习、很有志向的青年,参加“四清”工作队时主管青年工作,只因和一个女青年来往密切,约会时有亲热表示,被告发,开除团籍,1966年3月被勒令退学后回到原籍福建闽清;“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因反对江青、林彪以及中央文革,为被打倒的党政军“走资派”喊冤叫屈,成了福建省当年最大的“反革命案”,1970年2月28日,黄泽平被处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泽平反革命案被推翻,说是为老一辈革命家鸣不平,宣布无罪,但仍坚持说他有反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这个罪责又该谁来承担?杨邦俊在文中说:“文化大革命”扼杀了国民的理性心态;暴力、政权的力量制造了一大批奴性十足的顺民,任何敢于表达自己独立思考的人,在那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疯狂年代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残酷甚至残忍对待作为“弃子”的老五届学生的事俯拾皆是。比如,图书馆学系1964级的马士林被发配到华阴部队农场,深秋时节要在凛冽的寒风中“站在没膝甚至齐腰深的冰冷刺骨的泥水里,抢收头年种下的黄豆和高粱。……不少女同学因此而落下隐患、暗疾。最脏的活儿自然要数为修建营房而到火车站去拉煤卸灰。当我们‘麻袋头顶披,草绳腰间系’,灰头土脑,蓬头垢面,经过华阴县城时,总有老乡指指戳戳:看,解放军又押了一车劳改犯!”(《回眸一笑百感生》)这种残酷不仅在于身体被毁损,更在于要彻底打掉你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又如,国际政治系

1963级张万平在《艰苦的岁月 难忘的磨砺》一文中叙述了在黑龙江部队农场井下刨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豪情壮举”，以及数学系1962级李国治发配到洞庭湖大通湖部队农场，在长满钉子似的野菱角的田里干活时，脚上布满了断在肉里的野菱角刺，几天后发炎化脓，走路一瘸一拐的。“更可怕的是：等再下到田里，当新的菱角刺正好扎到已经溃烂的伤口时，那种钻心般的疼是常人无法忍受的！”（《未名湖—洞庭湖—浏阳河》）。这难道是“锻炼”？纯粹是折磨，是摧残，是草菅人命！

至于说到悲惨，本集中虽然没有像第1集里《殇痛牛田洋》那样惨痛的悲剧描述，但刻骨铭心的殇痛场景也是够多的。比如，沈耀才文章描述的青海部队农场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曹万芝为在湍急的黄河里捞木头而被漩涡吞没，遗有一妻二子，不予追认烈士，因为捞木头没有经国家批准；张万平写下了黑龙江部队农场黄元华同学因伐木时树干抡起击中腰部而牺牲的情节；至于濒临死亡边缘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那种因无谓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造成的牺牲，只能说明对待人间最宝贵的生命的轻率与漠视！

本集叙述的老五届作为“弃子”的年代实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极端年代，要是有人认为这是使他们成为才子而担“大任”的历练，我宁愿不挑“大任”而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员。持这类看法的人，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陷入苦难深渊而不能自拔，甚至是别有用心、骗人。真是这样，就有再次被置于那种不幸境地的危险！事实胜于雄辩，那个年代到底是成人多还是毁人多，大家心知肚明。我们只要读到历史系1961级李永昌在《北大荒岁月和我的回归》一文中说他是“世界史专业同届毕业27人中唯一从事世界史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这句话就足见一斑了。至于那些被弃、被毁的人后来又担“大任”了，这不是悲惨磨难的历练之功，而有下面要说到的浸润过未名湖之水的灵气之功。

作为学者，我当然对于那种斯文扫地、学而不能用的状况更有切肤之痛。那个时代，我和第2集中胡戟的文章《走访教育部信访室》里所描述的对国家学术前途的担忧有强烈共鸣：“将来不是要像陈寅恪先生说的那样，中国人的历史要去问日本人，‘群趋东邻受国史’吗？”胡戟是学历史的，我那时在汉中分校无线电系工作。在招收工农兵学员时，我为量子电子学专业（当时“以典型产品带动教学”，这个专业被称为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频标专业）编写了教学计划，时任分校教改组负责人的我系原主任汪永铨先生问我：你们专业学生不学量子力学行么？我甩出了一句话：“大不了将来再来一次‘幼童留美’！”^①我内心充满凄凉与纠结：要从初中代数教起的工农兵学员在三年内学好量子力学，不是天方夜谭么？懂得原子物理的基本概念足矣！可惜，不幸被我言中一半。

① “幼童留美”指由容闳倡议清政府组织的少年赴美国留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几次活动。

这样的历史教训难道不要牢牢汲取吗？这样的历史难道还可重演么？！

三、永不可灭的精神

上面说过，北大老五届在各种岗位还是担了“大任”，成为骨干的。我同意钱理群先生指出的，这是由于他们的“精神坚守”，但也不应遗忘“底层体验”。钱先生说“精神坚守”，说明他们在“告别未名湖”之前就已经树立起某些精神了。我想这就是北大精神，至少是当年的北大精神。精神其实就是一种价值信仰。这东西就这么神奇，只要你沾上了北大的边，哪怕只有一小段时间，就像有的老五届那样，就会被浸润、被感染、被熏陶。前面我提出了“北大之大”的命题，指的是北大的气度，气度里应该含有精神。我觉得从“北大老五届行迹”中可以体察到的当年北大精神，起码应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担当精神。这其实就是“志”。一个学生抱定了要上北大的“志”，就是给自己选择了一种责任，设定了一份担当，对社会、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和担当。有这种担当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跟西方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宋朝大儒张载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是体现了这种担当精神的极致。我还认为这种精神是源于正义的价值信仰。我把正义看成是处理“我”和“非我”——他人、社会、环境、国家、大自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关系的结晶。我们普通北大人没有张载那样的宏伟志气，但深知对他人、社会与自然对自己的养育成长之所付总要抱着“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态度的。正是那种将自己的存在也归功于社会与自然的心态使北大老五届人走到哪里都要把工作做好，追求卓越，并能忍受极端的艰难困苦，真正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我钦佩北大学子不仅有对当前事业的担当，更有对历史责任的担当。例如，中文系1963级祁念曾在“文革”大批判的高潮中不但没有奉命写稿来批判“黑作家”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反而冒着巨大的风险将原稿保存了十二年，从而得以重见天日（《从燕园到深圳》）。同样，我们还看到中文系1964级董汉河，为了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成千上万的男女战士艰苦屈辱的蒙难历史得以大白于天下，他孤军奋斗勇闯禁区，付出了大半生心血却只能留下遗憾（《梦断大西北》）。使我特别感动的还有一篇小文章，俄语系1964级郑克中写的《我和陈惠民》。作者在写文章（2011年12月）的前几天忽然收到邮寄来的一床被子，那是老同学陈惠民从浙江云和寄来的。原委是：1966年“文革”的大串联中陈惠民背了作者的薄被去“长征”，回来时被子已经烂了，是另一位同学给了作者又一床被子。近半个世纪以后，陈惠民来“赔偿”了。这当然是诚挚友谊的纪念。但从这里可见陈惠民的真！文中描述陈惠民被发落到浙西一个小县的穷乡僻壤当农村教师，之后成为中学教师，最后当了县图书馆馆长，对当地文

化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该馆被国家评为一级图书馆，他被授予特殊贡献人才称号。他写的书有老师万宁教授作序，其中说：“命运安排他在中国一县，做了一场有意义的实验，用一生的探索，映画出一点点生命的绮彩。北大以国宝级大师为荣，其学子多数身居高端；偶然的原因，一枚种子飘落到中国草根阶层，营造出一派平淡中的绚烂。绚烂之极的平淡，也算是一个稀罕的传奇故事吧。”

第二是追求精神，追求真善美，追求卓越。真善美是科学与人文的治学终极目标。置身于文理学科的学习与研究，就离不开这样的追求。而有了这样的追求就会处处事事与众不同。北大老五届学子不仅有文革初期就以“方史”为笔名讨伐姚文元，为吴晗的《海瑞罢官》辩白的图书馆学系1964级的李永长，而且还有认识到清查起义军官在战争中是否有“人命案子”是“天大笑话”，拒绝写假大空文章，不办错案的检察官，最后因不恋当官而当了“教官”的（法律系1963级于远河：《坎坷曲折的圆梦路》）；还有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坚持“这是个人的不幸，也是党和国家的不幸。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尽早给予平反，公正、正义应该尽早回归”，敢于顶撞领导的小公务员（中文系1965级周炳华：《位卑未敢忘忧民》）。正是因为这些“较真”的脾性，就有了一种说法：“成也北大（做事），败也北大（做官）”。不少文章叙述的事实确实也应验了这句话。

不过，对于理科学生来说，由于底层的“一穷二白”环境，那种“求真”的科学本事确实还很难施展。即使如此，还有几则故事可以显出北大理科学子不凡的起码是“较真”的精神。一是数力系1963级王铎的文章《难忘的鹤岗十年》揭示的，他1968年底被发配到鹤岗，先在煤矿劳动，后到其附中教书，因“工人阶级要占领讲台”而将此“臭老九”赶走，被打发去办农场。领导分配要用土豆做粉条，请来老农粉匠，粉条总是做不成，一段段的连不成长条。北大人按照华罗庚的0.618优选法，调整粉面加矾和水的比例，竟然成功，他被公认为“大粉匠”。再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学数学的李国治，在湘赣边界的浏阳县，发挥他基础扎实、自学能力强的优势和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联合一批能工巧匠居然造出了12千瓦的水轮发电机（《未名湖—洞庭湖—浏阳河》）。还有一个是地球物理系1963级的汪景琇。他1970年先被分配到生产队劳动，后当乡村教师，1973年到县气象站做了气象员，居然在穷乡僻壤创造了单站气象预报方法。他的工作成为气象站预报的一个基本方法，论文被选入全国性的气象预报文集，本人被选为省气象战线先进工作者。1978年他考上了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的研究生，以后又在天文学研究上做出杰出成绩而被选为中科院院士。

第三是独立和自由精神。独立是大学的立校之本，是大学运行的基本原则；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必由之路。所以独立和自由精神是与追求真善美相通的。陈寅恪先生在纪念王国维的碑文上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揭示了科学追求的真谛。当年北大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为名、不

为利的豁达态度和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独立求真精神，在北大老五届的书内几乎是随处可见，不一一细说了。这里只想提一桩极其细微的小事。1970年毕业分配的时候，国政系1964级的陈世崇其实是很愿意留校的。可是，当他看到系里老师排成一队在39楼前被工宣队成员一会儿喊“立正”，一会儿喊“稍息”，纯粹是折腾人，稍一不合要求，就被像“孙子”那样训人的景象深深地刺痛了：最高学府却没有起码的人的尊严！于是当宣传队员问他愿不愿留校时，他就赌气说“不愿意”。他想：宣传队也许要永远领导学校，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这小伙子的倔强就意味着独立。后来他到北京市文化局工作，又去了一个“打死也没人去的地方”，却搞得十分红火。之后有人告诉他受此遭遇的原因：一条意见——不听话！他在《梦里何曾别燕园》一文中总结说：“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独立思考，认为对的敢于坚持；在工作和事业中，不固步自封，不甘人后，敢为人先。这是不是就是‘民主与科学’精神浸润的结果呢？……我认为是。”

陈世崇的同班同学刘旦元后来贵阳市花溪区教育局工作，同样是一条硬汉：说真话，不说假话。在区人大预算决议案和区委选书记会上，他都投了反对票，他认为这是“不辱北大人的风骨”；而他的三瓶茅台酒的故事则“见证了北大人的品格”（《磨难中的道德坚守》）。上面说到的历史系1961级李永昌总结自己：“几十年里，从学生到教师，一路走来，感慨良多。品味所见，人世多错迁，但是，无论为人、治学、处世，必须为自己设置一个任何时候都不能逾越的道德底线。身处逆境，也必须要有古代文人具有的那种‘出淤泥而不染’、清高、寡和，孑然自立的气质。……老五届的经历证明：我们不依附任何人，不攀龙附凤，孜孜不倦，奋斗不息，仰望无愧于天，沉思无愧于地，毕生保持北大人的节操和品格。”（《北大荒岁月和我的回归》）

第四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前面提到，这是因梁启超在清华的讲话而引出的清华校训。但是，随着院系调整清华大批名师涌入北大，这种精神自然就成为北大精神的一部分了。我有这样的想法，还是在读了哲学系1964级胥正范的《平平常常才是真》的文章之后才萌发的。她说，她在校时，德高望重的张岱年先生经常用《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学生，所以她就将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可见他们对北大学子的影响至深。确实，从文集的篇篇文章都可看得出北大老五届人就是这样奋斗不息的。胥正范后来一直从事哲学教学，她在总结自己经历时认为：“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废。过分自强容易把身体搞垮，宏图大志无法实现；而无所事事，只求安逸宁静更是不可取的。”这些朴实无华的直白语言倒是反映实际，说明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前者使人奋斗不止，后者使人平和坦荡，两者完美的统一，就能让生命如有源头活水，急速奔流，又宽畅浩瀚。

上面说的，笼统地就可归结为志、德、识三方面。这其实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成为真正的人、大写的人的基本要素。志乃是一种信仰，是统率的。中国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价值信仰是有的，知道应该怎样做人。人没有了信仰，就一切空虚。当下党和政府倡导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就是要培育和践行一种价值信仰，是符合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的。我个人认为，它们还可表述得更为简洁：正义和真善美！至于德和识，可以说是实现志的两翼。德确定做人的基本规矩，至少要有个底线，不能做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识不仅是知识，社会知识、自然知识，以及专业知识，这里更重要的还在于辨识、判断是非、正误、优劣、真善美和假恶丑之间的区别和界限的能力。有了德和识就可成全志。当然，北大人的精神也许还远不止于此，它们通统包容在“北大之大”里面了。一个人的事业，成就，时过境迁，可以化为乌有，而精神是长存的，“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大家写下了《北大老五届行迹》，就是要昭示后人：我们所遭受的辛酸和悲痛永远不能再演，但是我们所坚守的当年北大人的精神，却是永恒的，要靠后人来继承。

我唠唠叨叨说了这么多，无非是因为读了那么多鲜活生命的流淌行迹，感人肺腑，甚至催人泪下！北大老五届的群体经历确实应该是北大历史上珍贵的一页，是所有北大人共同的精神财富。它昭示后人：北大人中曾经有这样的群体，他们遭受过冷酷的轻侮和摧残，经历过极端的苦难、艰辛和悲惨，但是，他们没有退缩，没有消沉，更没有与邪恶同流合污，而是坚守北大精神，奋斗不止，终于都成为一个个大写的人，为事业、为民众、为地方、为国家，乃至为世界作出了自己的奉献。他们以曾经的北大人为荣，北大也以他们而骄傲！“北大之大”包含着他们的辛酸与苦难，包容着他们的成就和荣光。他们将这些遭遇与经历写出来，表明他们在高喊：悲惨的历史绝不可重演，崇高的精神不可磨灭，并将永放光芒！

王义通

2015年6月3日于蓝旗营抱拙居，6月14日改定